

列 宁 国 家 与 革 命

第 二 分 册

人 民 出 版 社

В. И. ЛЕНИН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РЕВОЛЮЦИЯ

本书译文采自《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5 卷,这次
排印第七版时,译者对译文又作了一次修订。

列 宁
国 家 与 革 命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译
列 宁 斯大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中国工业出版社第一印刷厂印刷

根据 1964 年 9 月第 7 版

1970 年 12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书号 1001·595 每部(二册共)0.85 元

第 四 章

续前 恩格斯的补充说明

马克思对公社经验的意义问题指出了基本的要点。恩格斯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个问题，说明马克思的分析和结论，并且有时非常有力非常突出地阐明这个问题的**其他**方面，因此我们必须特别来谈谈这些说明。

1. “住 宅 问 题”

恩格斯在他论住宅问题的著作(1872年)中，已经考虑到了公社的经验，并且屡次谈到革命对于国家的任务。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谈到这个具体问题时，一方面明显地说明了无产阶级国家同现代国家相似的地方，根据这些相似的地方我们可以把前者和后者都称为国家；另一方面他又说明了前者不同于后者的地方，即向国家消灭的过渡。

“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呢？在现代社会里，解决这个问题同解决其他一切社会问题完全一样，即靠供求关系在经济上的逐渐均衡来解决，但是这样解决之后，这个问题还会不断产生，就是说，一点也没有解决。社会革命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不仅要以时间地点为转移，而且也同一些意义深远的问题有关，其中最重要

的问题之一就是消灭城乡对立的问题。既然我们不预备凭空设想一套未来的社会结构，也就用不着在这上面浪费时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现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够的住宅，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帮助解决真正的住宅**缺乏**问题。当然，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剥夺现在的房主，让没有房子住或现在住得很挤的工人搬到这些住宅里去。只要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这种有关社会福利的措施就会象现代国家剥夺其他东西和占据住宅那样容易实现了。”（1887年德文版第22页）¹⁶

这里没有谈国家政权形式的改变，只是谈到了国家政权活动的内容。根据现代国家的命令也进行剥夺和占据住宅的活动。无产阶级的国家，从形式上来讲，也会“下令”占据住宅和剥夺房屋。但是很明显，旧的执行机构，即与资产阶级相联系的官吏机构，是根本不能用来执行无产阶级国家的命令的。

……“必须指出，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一切劳动工具和全部工业，是同蒲鲁东主义的‘赎买’办法完全相反的。如果采用后一种办法，单个劳动者将成为某一所住宅、某一块农民土地、某些劳动工具的所有者；如果采用前一种办法，则‘劳动人民’将成为全部住宅、工厂和劳动工具的集体所有者。这些住宅、工厂等等，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

会。所以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一切劳动工具，无论如何都不排除承租和出租的保存。”（第 68 页）

我们在下一章将要考察在这段论述中提到的问题，即关于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的问题。恩格斯非常谨慎，他说无产阶级国家“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分配住宅。把属于全民的住宅租给单个家庭就既要征收租金，又要实行一定的监督，还要规定分配住宅的某种标准。这一切都要求有一定的国家形式，但决不需要特殊的军事和官僚机构及其享有特权的官员。至于过渡到免费分配住宅，那是与国家的完全“消亡”联系着的。

恩格斯谈到布朗基主义者在公社以后因受到公社经验的影响而转到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上来的时候，曾顺便把这个立场表述如下：

……“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政治行动，必须实行专政以过渡到废除阶级并和阶级一起废除国家”……（第 55 页）

那些喜欢咬文嚼字的批评家或者“糟蹋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大概以为，在这里**承认**“废除国家”，在上述《反杜林论》的一段论述中又把这个公式当做无政府主义的公式加以否定，这是矛盾的。如果机会主义者把恩格斯算做“无政府主义者”，那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社会沙文主义者斥责国际主义者是无政府主义者的风气现在已经愈来愈流行了。

国家会随着阶级的废除而废除，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常

教导我们的。《反杜林论》的那段人所共知的关于“国家消亡”的论述，并不是单纯斥责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废除国家，而是斥责他们鼓吹可以“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

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民主主义”学说把马克思主义在消灭国家问题上对无政府主义的态度完全歪曲了，因此我们来回忆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无政府主义者的一次论战，是特别有益的。

2. 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这次论战发生在187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把驳斥蒲鲁东主义者即“自治论者”或“反权威主义者”的论文寄给意大利的一个社会主义文集。这些论文在1913年才译成德文发表在《新时代》上¹⁷。

马克思讥笑无政府主义者否认政治时写道，……“如果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采取革命的形式，如果工人建立起自己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那他们就犯了侮辱原则的莫大罪行，因为工人为了满足自己低微的起码的日常需要，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竟不放下武器，不废除国家，而赋予国家以一种革命的暂时的形式”……（1913—1914年《新时代》第32年卷第1卷第40页）

马克思在驳斥无政府主义者时，只是反对这样的“废除”国家！马克思完全不是反对国家将随阶级的消失而消

失，或国家将随阶级的废除而废除，而是反对要工人拒绝使用武器，拒绝使用有组织的暴力，**即拒绝**使用以“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为目的的**国家**。

马克思故意着重指出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国家具有“革命的**暂时的形式**”，以免人们歪曲他同无政府主义斗争的真正意思。无产阶级需要国家只是暂时的。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都认为废除国家是**目的**，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没有分歧。但我们肯定地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暂时利用国家权力的工具、手段、方法去**反对**剥削者，正如为了消灭阶级，就必须实行被压迫阶级的暂时专政一样。马克思在驳斥无政府主义者时，把问题提得非常尖锐，非常明确：工人在推翻了资本家的压迫以后，应当“放下武器”呢，还是应当利用它来反对资本家，粉碎他们的反抗？一个阶级有系统地利用武器反对另一个阶级，如果不利用那种“暂时的形式”的国家，又利用什么呢？

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应该问问自己：他在同无政府主义者论战时是**这样**提出国家问题的吗？第二国际绝大多数正式的社会党是**这样**提出国家问题的吗？

恩格斯更加详尽更加通俗地阐明了这同一个思想。他首先讥笑蒲鲁东主义者的糊涂观念，他们自命为“反权威主义者”，否认任何权威、任何服从、任何权力。恩格斯说，试拿工厂、铁路、航海的轮船来说，这是一些使用机器的、很多人有计划地共同工作的复杂技术企业，如果没有一定的服从，因而没有一定的权威或权力，那就没有一样能够开动起

来,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恩格斯写道:……“如果我拿这种论据来反对最顽固的反权威主义者,那他们就只能给我如下的回答:‘是的!这是对的,但是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我们赋予我们的代表的那种权威,而是**某种委托**。’这些人以为,只要改变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一事物本身”……

恩格斯由此指明了权威和自治都是相对的概念,运用它们的范围随着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改变,把它们看做绝对的东西是荒谬的,并且补充说,使用机器和大规模生产的范围在日益扩大,然后恩格斯从权威问题的一般论述转到国家问题。

恩格斯写道:……“如果自治论者仅仅是想说,未来的社会组织只会在生产条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内允许权威存在,那也许还可以同他们说通。但是,他们闭眼不看一切使权威成为必要的事实,只是拚命反对字眼。

为什么反权威主义者不只是限于高喊反对政治权威,反对国家呢?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在那些产生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废除以前,一举把政治国家废除。他们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

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迫于必要，不得不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也太少了吗？总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权威主义者自己不知所云，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只是在散布糊涂观念；或者他们是知道的，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是在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第39页）

在这些论述中涉及了在考察国家消亡时期的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下一章要专门论述这个问题）时应该考察的问题。那就是关于社会职能由政治职能变为简单管理职能的问题和关于“政治国家”的问题。后面这个说法特别容易引起误会，它指出了国家消亡的过程：正在消亡的国家在它消亡的一定阶段，可以叫做非政治国家。

恩格斯这些论述中最精彩的地方，又是他用来反驳无政府主义者的问题提法。愿意做恩格斯的学生的社会民主党人，从1873年以来同无政府主义者争论过无数次，但他们在争论时所采取的态度，恰巧**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而且应该采取的。无政府主义者对废除国家的观念是糊涂的，而且是**不革命的**，恩格斯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无政府

主义者不愿看见的，正是革命的产生和发展，正是革命对暴力、权威、政权、国家的特殊任务。

现在社会民主党人通常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可以归结为纯粹市侩式的极其庸俗的一句话：“我们承认国家，而无政府主义者不承认！”这样庸俗的论调自然不能不使那些稍有思想的革命工人感到厌恶。恩格斯就不是这样谈问题的。他着重指出，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承认国家的消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然后他具体提出了关于革命的问题，这个问题恰巧是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通常避而不谈而留给无政府主义者去专门“研究”的。恩格斯一提出这个问题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公社难道不应该**更多地**运用**国家的革命**政权，即运用武装起来并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吗？

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对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具体任务问题，通常是简单地用庸人的讥笑口吻来敷衍，至多也不过是用诡辩来搪塞，说什么“将来再看吧”。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有权责备这样的社会民主党，责备他们背弃了对工人进行革命教育的任务。恩格斯运用最近这次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正是为了十分具体地研究一下无产阶级对银行和国家究竟应该怎么办。

3. 给倍倍尔的信

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28日给倍倍尔的信中有下

面这样一段话，这段话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问题的著作中，如果不算是最精彩的论述，也得算是最精彩的论述之一。附带说一下，据我们所知，这封信第一次由倍倍尔发表在他 1911 年出版的回忆录（《我的一生》）第二卷里，也就是说在恩格斯写好并发出这封信的三十六年之后。

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里批判了也被马克思在给白拉克的有名的信里批判过的哥达纲领草案，并且特别谈到了国家问题，他写道：

……“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巴黎公社以后，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把我们挖苦得很够了，虽然马克思驳斥蒲鲁东的著作和后来的《共产党宣言》都已经直接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sich auflöst）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必须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末，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公团’（Gemeinwesen），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字，相当于法文中的‘公社’。”（德文原本第 321—322 页）¹⁸

应当指出：这封信是谈党纲的，这个党纲马克思在离这封信仅仅几星期以后的一封信（马克思的信写于1875年5月5日）里也作了批判；当时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住在伦敦。因此，恩格斯在最后一句话里用“我们”二字，无疑是以他自己和马克思的名义向德国工人党的领袖建议，把“国家”一词**从党纲中去掉**，用“公团”来代替。

如果向现在这种为了机会主义者的方便而伪造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首领们建议这样来修改党纲，那他们该会怎样狂吠，骂这是“无政府主义”啊！

让他们狂吠吧。资产阶级会因此称赞他们的。

我们还是要做我们自己的事情。在审查我们的党纲时，绝对必须考虑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意见，以便更接近真理，以便清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而恢复马克思主义，以便更正确地指导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在布尔什维克当中大概不会有人反对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意见。困难也许只是在用词上。德文中有两个词都作“公团”解释，恩格斯用的那个词**不是**指单个的公团，而是指公团的总和即公团体系。俄文中没有这样一个词，也许只好采用法文中的“公社”一词，虽然这也有它的不便之处。

“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这是恩格斯在理论上最重要的论断。看了上文以后，这个论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公社**已经不**成其为国家了，因为公社所要镇压的不是大多数居民，而是少数居民（剥削者）；它已经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居民已经自己上台来代替实行镇

压的**特殊**力量。所有这一切都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如果公社得到巩固，那末公社的国家痕迹就会自行“消亡”，它就用不着“废除”国家机构，因为国家机构将逐渐无事可做而随着失去其作用。

“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挖苦我们”，——恩格斯的这句话首先是指巴枯宁和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攻击说的。恩格斯认为他攻击得对，**因为**“人民国家”象“自由的人民国家”一样，是无稽之谈，都是离开社会主义的。恩格斯竭力地纠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使这个斗争在原则上正确，清除它在“国家”问题上的种种机会主义偏见。真可惜！恩格斯的这封信竟被搁置了三十六年。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即使在这封信发表以后，考茨基实际上还是顽固地重犯恩格斯警告过的那些错误。

倍倍尔在1875年9月21日写回信给恩格斯，信中顺便谈到他“完全同意”恩格斯对纲领草案的判断，并说他责备了李卜克内西的让步态度（倍倍尔的回忆录德文版第2卷第334页）。但是把倍倍尔的《我们的目的》（《Unsere Ziele》）这本小册子拿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关于国家的完全不正确的议论：

“国家应当由基于**阶级统治**的国家变成**人民国家**。”（《我们的目的》1886年德文版第14页）

这就是倍倍尔那本小册子**第九版**（第九版！）中的话！难怪德国社会民主党还是如此顽固地重复着关于国家问题的

机会主义议论，特别是在恩格斯所作的革命解释被人搁置起来而整个生活环境又长期使人“忘记”革命的时候。

4. 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

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时，不能不提到恩格斯在1891年6月29日寄给考茨基而过了十年以后才在《新时代》上发表的爱尔福特纲领草案¹⁹批判，因为这篇文章主要就是批判社会民主党在**国家**结构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的。

顺便指出，恩格斯还对经济问题作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指示，这说明恩格斯是如何细心、如何深刻地考察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种种变化，从而说明了他是如何善于在一定程度上预先想到当前帝国主义时代的任务。这个指示是恩格斯由于该纲领草案用“无计划”（Planlosigkeit）这几个字来说明资本主义的特征而作的，他写道：

……“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末，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1901—1902年《新时代》第20年卷第1卷第8页）

这里指出了对现代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理论评价中最主要的东西，即资本主义变成了垄断**资本主义**。后面这四个字必须加上着重号，因为目前最普遍的一种错误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所断言的什么垄断资本主义或国家垄

断资本主义**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已经可以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等等。完备的计划性当然是托拉斯所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尽管托拉斯有计划性，尽管资本大王们预先考虑到了一国范围内甚至国际范围内的生产规模，尽管他们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但是现在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虽然是在它的新阶段，但无疑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在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看来，**这种**资本主义之“接近”社会主义，只是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接近，已经不难实现，已经可以实现，已经不容延缓，而决不是证明可以容忍一切改良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粉饰资本主义。

现在我们回过来讲国家问题。恩格斯在这里作了三类特别宝贵的指示：第一类是关于共和国问题；第二类是关于民族问题同国家结构的联系；第三类是关于地方自治。

关于共和国，恩格斯把这点作为批判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重点。如果我们还记得当时爱尔福特纲领在整个国际社会民主运动中具有怎样的意义，它怎样成了整个第二国际的典范，那末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恩格斯在这里是批判了整个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

恩格斯写道：“草案的政治要求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这里没有说（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本来应当说的东西。”

接着，恩格斯解释道，德国的宪法实质上是1850年最反动的宪法的抄本；正如威廉·李卜克内西所说的，帝国国会只是“专制制度的遮羞布”；想在规定各小邦存在、德意志

各小邦结成联盟的宪法的基础上实现“将一切劳动工具转变成公有财产”，那“显然是荒谬的”。

“谈论这个问题是危险的”，——恩格斯补充说，因为他深知在德国不能在纲领中公开提出建立共和国的要求。但是，恩格斯并不因为这个理由很明显，“大家都满意，就这样算了。他接着说：“但是，无论如何，事情总是要去解决的。这样做是多么必要，正好现在由在很大一部分社会民主党报刊中散布 (einreissende) 的机会主义证明了。现在有人因害怕反社会党人法重新恢复，或者回想起在这项法律统治下发表的几篇过早的声明，就想要党承认在德国的现行法律秩序下，可以和平地实现党的一切要求”……

恩格斯把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行动是出于害怕非常法重新恢复这个主要事实提到首位，毫不犹豫地称之为机会主义，而且说明，正是因为德国没有共和制和自由，所以幻想走“和平”道路是十分荒谬的。恩格斯非常谨慎，他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他承认，在有共和制或有充分自由的国家里，和平地向社会主义发展是“可以设想”的（仅仅是“设想”！），但是在德国，他重复说：

……“在德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其他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因此，在德国宣布某种类似的做法，而且在没有任何必要的情况下宣布这种做法，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盖那赤裸裸的东西”……

德国社会民主党把这些指示“束之高阁”，党的绝大多数正式领袖果然就成了专制制度的遮羞者。

……“这样的政策归根到底只能把党引入迷途。人们把一般的抽象的政治问题提到首要地位，从而把那些在重大事件一旦发生，政治危机一旦来临就会自行提到日程上来的迫切的具体问题掩盖起来。这除了使党突然在决定性的时刻束手无策，使党在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由于从未进行过讨论而认识模糊和意见不一致而外，还能有什么结果呢……

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

如果说有什么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恩格斯在这里特别明确地重述了象红线一样贯穿在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的基本思想，这就是：民主共和国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捷径。因为这样的共和国虽然丝毫没有消除资本的统治，因而也丝毫没有消除对群众的压迫和阶级斗争，但是，它必然会使这个斗争扩大、展开、明朗化和尖锐化，以致一有可能满足被压迫群众的根本利益时，这种可能